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刘玉成,王丽颖.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三期 CFPS 面板数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2):114-124.

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三期 CFPS 面板数据

刘玉成 王丽颖

(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在我国劳动力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激烈碰撞,必然会对劳动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产生冲击效应。文章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面板模型,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分析等方法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劳动力流动会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总消费水平明显更高。(2)劳动力流动引起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改善,导致居民家庭支出由必需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消费升级未来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3)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主要导致户主为男性以及老一代群体的消费增加,并促进农村和中部地区居民的家庭消费增加。(4)绝对收入和预期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消费的机制中均存在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政府作用、群体差异性、区域异质性等视角,针对劳动力流动和家庭消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居民家庭消费;中介效应;异质性

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2-0114-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外部需求的增长策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但这种策略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深层次矛盾(汪伟,2017)^[1]。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外部需求日益疲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并且高投资的积累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仅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

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此,国家提出扩大消费内需、壮大国内消费市场来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让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共同拉动经济发展。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激活经济的内生动力,关键在于促进居民消费,尤其是开发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潜力,提升家庭消费的战略地位(唐博文等,2022)^[2]。

收稿日期:2022-11-18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区域协同视角下长江经济带人才共享的福利效应与协调机制研究”(20Y033);长江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资源共享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研究”(2021csz01)

第一作者简介:刘玉成(1970—),男,湖北荆门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与产业经济研究。

通信作者:王丽颖(1999—),女,河北张家口人,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E-mail:1285672024@qq.com。

随着我国民生领域内体制机制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正逐渐得到破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越来越频繁。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也对居民家庭消费带来了影响。究其原因,劳动力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等方面将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些都会对劳动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产生冲击。但是由于传统观念以及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劳动力流动大多具有迂而不移的特征,流动劳动力往往大规模地游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其消费也具有明显的分割效应,具体表现为流出地消费与流入地消费并存,这必将对其家庭消费产生影响。为了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及影响路径,本文将基于2014、2016、2018三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为基础,通过家庭与个人匹配来构建平衡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分别以恩格尔系数、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来衡量家庭消费,从多个视角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2)分别以劳动力流动、劳动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流动变量,从多个维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3)基于覆盖面更广的多期、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避免了同类选题研究中单纯考察时间维度或者截面维度带来的偏差;(4)考察了绝对收入和预期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从而识别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

二、文献综述

现代西方消费理论起源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到的绝对收入假说,随后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Keynes, 1936; Duesenberry, 1949; Friedmann, 1957)^[3~5]、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Leland, 1968; Zeldes, 1989)^[6~7]等观点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消费的基础理论框架。我国学者也围绕消费问题作了大量拓展性研究,近年来关于居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延伸到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涂颖清等, 2022)^[8]、社会保障(张佩茹, 2022)^[9]、互联网发展(汪洋等, 2022)^[10]、人口就业(张卿等, 2022)^[11]等领域。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

庭消费的影响,但由于观察对象、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在劳动力流动是否会影响居民家庭消费、影响方向、影响机理与影响路径方面,尚未能形成一致的结论。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梳理如下:

(1)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总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对家庭消费总量产生影响,但在影响方向上争议较大。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正向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比如李亮等(2016)^[12]从消费能力和观念两方面入手,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而且还会显著提高消费的边际收入倾向;文洪星等(2018)^[13]在综合分析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的叠加效果后,也认为劳动力流动能够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黄大湖等(2022)^[14]考察劳动力流动的溢出效应后发现,劳动力流动不仅会提高本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还显著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居民消费,但不同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杨春丽, 2021)^[15]。与之相反,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较小甚至为负向,Michael等(2000)^[16]认为流动劳动力在流入地面临不确定性风险时,会因风险防范的需要而减少当期家庭消费支出;杜鑫(2010)^[17]认为劳动力流动超出户籍区域范围时,居民消费不会受到显著影响;黄容等(2013)^[18]认为劳动力流动仅对东、中部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则有着负向抑制作用;刘宗飞(2021)^[19]认为只有当家庭非农就业的规模达到80%时,非农就业才会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

(2)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国内外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改善居民家庭消费结构。Weil(1994)^[20]认为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比重上升,会增加教育和医疗保健消费需求,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得到被动改善;周建等(2009)^[21]、王萍等(2020)^[22]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物质条件改善、年龄结构变化和示范效应,这些都能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近年来部分学者利用微观数据,从细分视角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如黄容等(2013)^[18]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导致衣着、文教娱乐及服务、医疗消费增加,由此改善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宋明月等(2022)^[23]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并不能改善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消费惯性

的作用导致家庭消费在短期内对收入增长反应并不敏感(Carroll等,2000)^[24],再加上收入波动、医疗、失业、健康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有着更为强烈的储蓄意愿,消费水平整体上仍趋于保守,并未带来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尹志超等,2020)^[25]。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都比较繁重,高强度的工作不仅会挤压其休闲娱乐的时间,强烈的疲惫感也会降低其进行享受型消费的欲望,因此难以改善其消费结构(刘玉侠等,2014)^[26]。

现有文献在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上取得了较多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但仍存在有待改进的空间。从研究数据来看,受微观面板数据工作量大且复杂等条件限制,大多学者仍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样本容量较小,缺少对劳动力流动及其家庭消费变化的时间效应观察;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学者都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而基于细分消费结构(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的研究并不多。此外,已有研究在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影响异质性等方面还存在可拓展之处,而这些都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消费

劳动力流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基于市场均衡理论,劳动力流动实质上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力量自发调节的结果。从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来看,劳动力流动行为源于不同地区的劳动市场工资差异,工资差异的存在驱动劳动力从工资低的地区流向工资高的地区、从工资低的行业流向工资高的行业。从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来看,流动行为会使得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劳动市场工资差异不断缩小,并且这种工资差距的缩小主要表现为低工资者的工资较快提升和高工资者的工资缓慢增长。而由于高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高物价水平,因此,劳动力流动虽然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也使得劳动力及其家庭不得不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这将导致流动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为了能在异地维持其现有生活质量,不得不“被动”地提高其生活消费支出。另外,劳动力流动的发生还导致生活环境发生了转变,流入地居民的消费习惯与偏好也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流动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的意识中,从而驱动流动劳动力及其家庭寻求消费数量与品种的共性,由此产生“偏

好外部性”(黄蓉等,2014)^[27]。这种“偏好外部性”的存在,就使得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不仅在流动和迁徙中接受物价水平上升带来的生活消费的“被动”支出,而且会在流动中“主动”寻求能够提升自身效用水平的其他消费支出,从而增加家庭消费量。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

(二)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收入

我国居民家庭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绝大部分。劳动力流动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另一方面间接增加了留守人员的人均收入。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在就业需求和收入的驱使下,劳动力会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因此,流动行为的发生直接提高了劳动力家庭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其次,由于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比如农业生产)往往带有季节性的生产特征,并且劳动力的实际投入量往往大于其最优生产规模下的劳动需求量,从而导致在某一生产阶段,劳动力出现明显过剩,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而劳动力流动的发生,正好起到了优化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经验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后,可以使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4~5倍(邱爽,2003)^[28]。因此,劳动力流动的发生,会增加从事家庭经营的留守人员的经营收入,进而间接提升留守人员的人均收入。可见,劳动力流动不仅会增加家庭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还因为提高了原有经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其家庭经营收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劳动力流动会提高家庭收入。

(三)家庭收入与家庭消费

关于收入和消费的关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会根据其当期收入水平进行消费,而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的支出也会相应增加,但消费支出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从长期来看,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则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不仅会根据当期的收入来决定消费支出,而且会根据其一生中的总收入来决定消费支出。消费者将会通过储蓄来实现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跨时期的均匀消费,因此预期收入的提高也会导致消费支出相

应增加。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知,由于劳动力流动的发生,家庭收入首先在绝对数额上明显得到了提高,同时家庭收入的来源结构也得到了优化,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使得劳动力流动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增强,因此其预期收入将会提高。因此,家庭收入的增加不仅会在短期内增加其家庭消费支出,而且在长期内也会增加其家庭消费支出,其中贷款购房这一消费行为就明显体现了预期收入对家庭长期消费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家庭收入的提高会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

结合 H2 和 H3,本文提出假设 4:

H4: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选用混合估计或固定效应估计,如黄梦琪(2022)^[29]等学者主张采用混合估计模型,而朱德云(2022)^[30]等学者则主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对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进行统计意义上的比较,在进行模型回归前先对模型进行了 F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p=0.0000$,强烈拒绝“不存在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因此相较于混合估计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更优。为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尽量排除个体和时间效应遗漏所产生的偏差以得到更为精准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 \beta_2 Z_{it} + \sigm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代表被解释变量, X_{it} 代表解释变量, Z_{it} 代表控制变量, σ_t 代表不随个体异质性变化的时间效应, μ_i 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 ε_{it} 代表随机误差项。下标 i 表示不同样本个体, t 表示不同时间。

(二)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以 2014、2016、2018 年连续三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提供的微观样本为基础。CFPS 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抽样方法,对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其调查结果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社会变迁,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CFPS 数据具有样本基数大、覆盖面广、指标多等特点,为尽量避免样本误差对研究结果带来的不利影

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1)将三轮家庭调查问卷按照家庭编码进行匹配与合并,最后得到三期平衡面板数据。(2)剔除了与研究无关的问题,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控制变量选择。(3)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仅保留了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的样本,并剔除了数据中存在缺失值及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 19106 个有效观测值。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消费,按照家庭消费的特征,本文设定两个类型的变量分别进行处理:(1)家庭消费类型一。主要针对劳动力流动对整体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探究,按照国家统计局对消费支出的分类,居民消费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支出,因此本文直接用 CFPS 中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对数进行衡量。(2)家庭消费类型二。为进一步考察劳动力流动是否会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选取恩格尔系数、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恩格尔系数用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进行衡量,生存型消费定义为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和衣着鞋帽支出总和,享受型消费定义为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总和。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流动,本文设定了劳动力流动行为、劳动力流动规模和劳动力流动比例三个测量维度:(1)对于劳动力流动行为,以问卷中“您家是否有人外出务工”的调查结果作为劳动力流动的虚拟变量。(2)对于劳动流动的规模,以问卷中“外出打工名单”计算得出家庭劳动力流动人数。(3)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比例,则通过计算劳动力流动人数与家庭成员数之比得到。不同于大多数文献只关注笼统的户籍变化,本文的变量数据既反映了户籍地发生变更的流动群体,也反映了户籍没有发生过变动的流动群体,度量的劳动力流动准确性更高。

3.控制变量

家庭消费的影响因素众多,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尽可能减少遗漏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参照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了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人层面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工作单位类型及工作性质,家庭层面包括家庭规模、现金及存款、现住房产权、住房拥有量和建房

购房贷款;社会层面包括社会支持和政府补助。

4. 中介变量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了绝对收入和预期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消费的机制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绝对收入用家庭当年总收入的对数进行衡量;在预期收入方面,

借鉴朱德云等(2022)^[30]的定义方法,将未来信心水平与当期收入的乘积作为预期收入的代理指标,并作对数化处理。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型变量均作了对数化处理。

所有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消费总支出	家庭消费性总支出(对数)	10.463	0.941	0	15.343
	生存型消费支出	食品、居住、衣着鞋帽总支出(对数)	9.839	0.973	0	13.93
	享受型消费支出	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总支出(对数)	9.398	1.210	0	15.326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家庭总支出	0.327	0.294	0	18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家庭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有=1,没有=0	0.418	0.493	0	1
	劳动力流动人数	家庭劳动力外出总人数	0.685	0.981	0	8
	劳动力流动比例	劳动力流动人数/家庭成员人口数	0.168	0.242	0	1
个人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男=1,女=0	0.499	0.500	0	1
	户主年龄	单位:岁	48.305	16.961	16	104
	户主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不健康=5	3.072	1.243	1	5
	户主工作单位类型	为自己干活=0,受雇于他人=1	1.522	0.500	1	2
	户主工作性质	农业就业=0,非农就业=1	1.566	0.496	1	2
家庭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在家生活的总人数	3.313	1.663	1	21
	现金及存款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对数)	6.013	5.032	0	15.761
	现住房产权	是否拥有现住房产权:有=1,没有=0	0.854	0.353	0	1
	住房拥有量	除现住房是否还有其他住房:有=1,没有=0	0.182	0.385	0	1
社会控制变量	建房购房贷款	是否贷款买房、建房或装修:有=1,没有=0	0.102	0.303	0	1
	社会支持	是否收到过社会援助:有=1,没有=0	0.012	0.111	0	1
中介变量	政府补助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有=1,没有=0	0.847	0.360	0	1
	绝对收入	家庭当年总收入(对数)	10.349	1.465	0	15.936
	预期收入	未来信心水平×当期收入(对数)	11.691	1.618	0	17.322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分别以劳动力流动虚拟变量、劳动力流动人数、劳动力流动比例为解释变量,以家庭消费总支出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1)~(3),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中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变量后,劳动力流动虚拟变量、劳动力流动人数和劳动力流动比例的系数方向一致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总支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数量增加以及劳动力流动比例的上升均会带来家庭总消费增加,由此假设

H1得到了验证。

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如下:(1)个体层面影响。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比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消费支出量更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其家庭消费量会有所降低;户主健康状况越差,家庭消费量越少;相比受雇于他人,自己经营的户主承担着更多的经营风险,有着更低的消费意愿;户主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有着更高的消费水平。(2)家庭层面影响。家庭规模的增加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影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家生活的人数越多总消费支出会随之增加;现金存款的增加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良好的资金储备已不再是家

庭消费增加的主要推动力;是否拥有现住房所有权并不会对居民家庭消费欲望产生明显的影响,这可能与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国家住房相关政策的完善有关;进一步地,房产拥有量增加会对家庭消费带来显著正向影响,一般来说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本身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日常生活受购房支出的约束较小,而空闲房屋的租赁还可以带来更多收益用以提高家庭的消费;有建房、购房银行贷款的家庭,其消费会更高。借贷行为参照的是当前及未来预期

收入状况,有外债的家庭一般能够长期且稳定地获取中高收入,因此在良好经济条件支撑下,负债对家庭消费水平并不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资金流转所带来的更多效益、还贷压力下个体潜能更充分地激发,都推动着家庭消费的增加。(3)社会层面的影响。接受过社会支持和政府补助的家庭,其家庭消费量要比未接受到任何形式社会支持的家庭要大。这说明,政府的社会保障和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居民生活,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表 2 劳动力流动对消费的影响

变量	家庭消费总支出		
	(1)	(2)	(3)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0.046***	—
	劳动力流动人数	—	0.032***
	劳动力流动比例	—	—
个体特征	户主性别	0.025*	0.025*
	户主年龄	-0.003***	-0.003***
	户主健康状况	0.011*	0.011*
	户主工作单位类型	0.054**	0.052**
	户主工作性质	0.062***	0.063***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0.118***	0.118***
	现金及存款	0.001	0.001
	现住房产权	-0.010	-0.010
	住房拥有量	0.148***	0.146***
社会福利	建房购房贷款	0.116***	0.116***
	社会支持	0.115**	0.117**
	政府补助	0.043**	0.043**
	常数项	9.764***	9.760***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9106	19106
	R ²	0.085	0.086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10%、5%、1%概率水平下显著。下同。

2.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为探究劳动力流动是否会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模型(4)~(6)分别以恩格尔系数、生存型消费支出、享受型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表3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劳动力流动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5%以上水平显著,劳动力流动会使恩格尔系数显著降低,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有了明显的下降。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会增加居民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比没有务工人员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增加了4.

3%,享受型消费增加了5.4%,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日渐趋于多元化。综合模型(4)~(6)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带来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给扩大居民消费带来更多动力的同时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从模型(5)和模型(6)中核心解释变量的数值来看,劳动力流动给居民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带来的影响效应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享受型消费的增加幅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自身技能水平限制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家庭条件的改善,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家庭生活水平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外出务工人员所在的家

庭总体上仍处于注重基础消费的较低层次阶段。另一方面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都比较繁重,高强度的工作不仅会挤压其休闲娱乐的时间,而且

会带来疲惫感,这也会降低其进行享受型消费的欲望。综上分析可知,劳动力流动能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且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表3 劳动力流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变量		(4) 恩格尔系数	(5) 生存型消费	(6) 享受型消费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0.011**	0.043***	0.054**
个体特征	户主性别	0.004	0.033**	0.016
	户主年龄	0.000	-0.002***	-0.004***
	户主健康状况	-0.006***	-0.006	0.031***
	户主工作单位类型	-0.002	0.068***	0.051
	户主工作性质	-0.001	0.063***	0.061*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0.003	0.109***	0.138***
	现金及存款	0.001*	0.004**	0.004*
	现住房产权	0.004	0.017	-0.034
	住房拥有量	-0.024***	0.152***	0.118***
	建房购房贷款	-0.045***	0.160***	0.045
社会福利	社会支持	-0.027	-0.007	0.172**
	政府补助	-0.012	0.025	0.085***
	常数项	0.360***	9.125***	8.597***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N		19337	19485	19315
R ²		0.023	0.076	0.057

3. 异质性检验

为识别劳动力流动对不同特征个体的家庭消费是否有差异化影响,本文按照户主个体层面的男性与女性、老一代与年轻代差异,地区层面的城镇和乡村、东部和中西部差异来对整体样本进行分组比较。

其中代际划分是参考钱龙等(2020)^[31]的研究,以50岁为界限将家庭按照户主样本分为了年轻代和老一代。模型的因变量均采用消费总量。异质性检验结果分别见表4、表5。

表4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检验(户主分性别、年龄)

变量	性别异质性		代际异质性	
	(7) 男性	(8) 女性	(9) 年轻代	(10) 老一代
劳动力流动	0.054**	0.045	-0.003	0.0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N	10269	8837	11078	8028
R ²	0.084	0.094	0.076	0.095

(1) 男性和女性的异质性检验

表4中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显著增加了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消费量,但对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消费带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

表明在消费方面男性对劳动力流动的敏感度明显高于女性。本文对于这一结论的解释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家庭仍维持着“女主内、男主外”的生活方式。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作为家庭中的顶

梁柱,男性大多成为了劳动力流动的主体。新环境中社交范围的扩大和事业攀升的需要,都促使着男性群体消费的增加;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角色,并不是劳动力流动的主导者。但是女性大多在家庭中扮演财务管理者的角色,而女性往往更偏向于稳健型家庭消费,无论当期收入是否乐观,她们都会谨慎对待消费支出,因此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对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消费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

(2)代际间异质性检验

表 4 中模型(9)和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户主为老一代的家庭消费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户主为年轻一代的家庭消费并没有显著影响。探究代际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显示,年轻一代群体已

成为流动劳动力的主力军,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大规模的家庭化迁移难以实现,老人和儿童通常会成为家庭中的留守群体。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性的消费者会通过储蓄来安排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均匀消费,他们大多倾向于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预防性储蓄,以达成长期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流动行为难以为其当期消费带来显著的变化。对于老一代群体而言,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受到较大限制,其消费支出的增加主要源于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务工带来的收入;而外出务工者将大部分收入所得寄回家中用以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因此年轻一代往往扮演了家庭收入贡献者的角色,而老一代则扮演了家庭消费支出代理者的角色,由此导致了代际间的异质性结果。

表 5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检验(分地区)

变量	城乡异质性		地区异质性		
	(11) 城镇	(12) 乡村	(13) 东部地区	(14) 中部地区	(15) 西部地区
劳动力流动	0.013	0.065***	0.021	0.093***	0.0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N	7692	11297	8425	4761	5920
R ²	0.090	0.077	0.090	0.092	0.083

(3)区域间异质性检验

表 5 中模型(11)和模型(12)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居民的家庭总消费并有显著的作用,而对乡村居民的家庭总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本文解释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显示,乡村地区中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约为城镇的两倍,因此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阵地在于乡村而非城市。而农村地区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必然会给农村家庭消费带来最直接和显著的影响。而城镇地区中流动人口相对较少、占比并不大,因此这部分群体的流动行为带来的消费变化相对于城市总体家庭样本来说并不明显。

表 5 中模型(13)~(15)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仅对中部居民的家庭总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对其家庭总消费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不同区域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文解释为:东部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居民的整体经济

状况相对较好,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很难为家庭收入带来质的飞跃,较低的收入增幅并不会给东部地区的消费带来明显变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人口主要流出地,其消费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劳动力的素质和消费观念有关。中部地区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素质整体上高于西部地区,在流入目的地就业时具有更多相对优势,而向高收入部门转移所带来的增收效应为其在城市中长期立足提供了更多信心,因此相对西部地区来说,中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动能够带来显著的消费提升效应。而西部地区的务工人员往往不具有就业优势,在城市融入度和存在感相对更低,而且其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风险更大,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居安思危,将增加的收入储存起来用于应对可能的风险而不是用于扩大当期消费,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对西部地区的消费效应并不明显。

4. 中介效应检验

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流动会通过收

入效应这一路径对家庭总消费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检验绝对收入和预期收入的中介效应。参考温忠麟等(2004)^[3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文采用模型(16)~(19)检验绝对收入的中

介效应,采用模型(20)~(23)检验预期收入的中介效应。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也提供了Sobel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绝对收入的中介效应				预期收入的中介效应			
	绝对收入 (16)	总消费 (17)	总消费 (18)	总消费 (19)	预期收入 (20)	总消费 (21)	总消费 (22)	总消费 (23)
劳动力流动	0.342***	—	0.046***	0.027*	0.385***	—	0.046***	0.031*
绝对收入	—	0.072***	—	0.071***	—	—	—	—
预期收入	—	—	—	—	—	0.058***	—	0.0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N	19701	18943	19106	18943	18775	18052	19106	18052
R ²	0.049	0.101	0.085	0.101	0.053	0.098	0.085	0.099
Sobel 检验	Z=9.156***(<i>p</i> =0.000)				Z=8.402***(<i>p</i> =0.000)			

从表7中模型(16)~(19)的回归结果可知,劳动力流动和绝对收入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两者均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模型(19)是在模型(18)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纯收入)后的估计结果,比较模型(18)和(19),劳动力流动的系数由0.046下降至0.027。这表明加入绝对收入这一中介变量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将减弱。由此可知:绝对收入在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总消费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表中Sobel检验也给出了一致的结论。由于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因此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中,有52.65%由直接效应引起,47.35%是由中介效应导致的。同理,由模型(20)~(23)可知,预期收入与家庭消费之间也为正相关关系,比较模型(22)和(23)发现劳动流动的系数由0.046下降至0.031,因此预期收入也在劳动力

流动与家庭消费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为0.4145,因此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中,有58.55%是直接效应引起、41.45%是由中介效应引起的。因此假设H2~H4均得到验证。

5.稳健性检验

前文表2中采用了三种形式的解释变量,其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已经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补充检验:(1)继续采用替换变量法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采取扩大家庭消费支出统计口径的方式,将家庭总支出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其中包含了消费支出、购房支出、保障性支出等。(2)对数据中的连续变量进行1%截尾处理,以防止异常值的存在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和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24)	(25)	(26)
	原被解释变量	替换后的被解释变量	截尾处理后的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0.046***	0.056***	0.0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N	19106	19406	18645
R ²	0.085	0.103	0.086

从表7的结果可知,变更被解释变量的统计口

径、对被解释变量截尾处理之后,劳动力流动的回归

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综上所述可知,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影响效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绝对收入和预期收入的中介效应。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劳动力流动会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具体来说,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比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总消费水平明显更高。除此之外,个人、家庭、社会层面等因素均对家庭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层面的影响最应当引起重视。(2)劳动力流动引起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改善,导致居民家庭支出由必需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消费升级未来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3)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个体层面来看,劳动力流动行为主要导致户主为男性以及老一代群体的消费增加,对户主为女性和年轻代群体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从区域层面来看,劳动力流动主要导致农村和中部地区居民的家庭消费增加,而城镇、东部和西部地区并未受到显著影响。(4)绝对收入和预期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消费的机制中均存在着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增加居民家庭收入来促进家庭消费增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消费中的驱动作用。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减少流动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发挥内需积极作用的关键,政府应着力解决流动家庭所面临的随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问题,探索建立多元高效的农民工社保制度体系。建立流动人口社会福利长效机制,扩大转移支付覆盖面,落实流动群体的贫困救助,将政策优惠与现金补贴相结合,做到一视同仁、应保尽保。通过改善流动人口的制度处境,不断增强流动人口长期定居的欲望和安全感,以激发居民的消费活力。

(2)搭建包容式互动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群体示范效应,不断释放消费潜力。以基层社区为载体,在片区内定期组织公益志愿活动以及特色社区文化活动,鼓励城市居民以及流动人口共同参与、交流互动。愈发广泛的群体交集助推城市先进消费观念的

不断传播,在无形中加快流动人口向高层次消费靠拢的步伐,可以使群体示范效应得到更高效的发挥。同时也要不断拓展消费领域、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热点,用更高层次的新兴产业激发居民的消费欲望,为居民提高自身消费层次提供持久性的拉动力和吸引力。

(3)探索适用于不同群体的针对性政策。首先,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为女性劳动群体营造公平的外部环境,提高其在社会中的劳动参与率,以更可观的收入状况和更广泛的社交范围助推其消费的增加;其次,针对年轻代群体消费动力不足的现状,一方面,循序渐进地在全国推广普惠式育儿津贴的发放以分担年轻代群体养育子女成本,严格把控大城市的物价和房价水平,通过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来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率,警惕出现“低欲望消费”的现象。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养老保障体系,以解决年轻代群体赡养老人时在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最后,鉴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中西部地区既要加大对输出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又要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加快本地产业发展以增强区域内部劳动力吸纳能力,从整体上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

(4)将夯实家庭收入基础作为家庭消费扩大的中心环节,推动流动人口实现高质量稳定性就业。一方面,加大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支持,设立专项扶助基金,构建新生代流动人员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体系,提高受助家庭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以增加流动人员在新环境中获取优质就业机会和更高工资性收入的概率,为家庭消费提供持久驱动力;另一方面,结合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实行针对性劳动力保护制度,并根据物价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探索制定当地务工人员最低工资标准,努力实现流动人员工资增长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同步的目标。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能够增强流动人员的收入信心,促使其扩大当期消费。

参考文献:

- [1]汪伟.如何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J].学术月刊,2017(9).
- [2]唐博文,郭军.如何扩大农村内需: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2(3).
- [3]Keynes J.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London: Macmillan, 1936.
- [4]Duesenberry J.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5]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

- 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6]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1968(3).
- [7] Zeldes S. P.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uc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97).
- [8] 涂颖清, 万建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 企业经济, 2022(5).
- [9] 张佩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障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9).
- [10] 汪洋, 吴顺利. 服务业集聚、互联网发展与居民消费率变化——来自我国现代流通业的经验证据[J]. 中国流通经济, 2022(5).
- [11] 张卿, 李晶晶. 非正规就业、未来预期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 调研世界, 2022(4).
- [12] 李亮, 付婷婷. 收入、消费观念与农村迁移人口消费[J]. 消费经济, 2016(1).
- [13] 文洪星, 韩青.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3).
- [14] 黄大湖, 丁士军, 陈玉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空间效应视角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4).
- [15] 杨春丽. 人口流动常态化视域下消费效应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19).
- [16] Michael P. J., Arthur P. H. Decision support for a housing mobility program using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J]. Management Science, 2000(12).
- [17] 杜鑫. 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消费和投资水平的影响[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0(3).
- [18] 黄容, 毛中根.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 消费经济, 2013(4).
- [19] 刘宗飞. 农户非农就业比例对其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21(2).
- [20] Weil D. N. The saving of the elderly in micro and macro dat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1).
- [21] 周建, 杨秀祯. 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1).
- [22] 王萍, 张亚欣, 张金锁. 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转型的影响路径[J]. 人口与经济, 2020(6).
- [23] 宋明月, 周博文, 何伟. 流动范围是否影响了家庭消费支出? ——基于农村流动人口数据的实证分析[J]. 浙江学刊, 2022(2).
- [24] Carroll C. D., Overl J., Weil D. N. Saving and growth with habit 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3).
- [25] 尹志超, 刘秦星, 张诚.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
- [26] 刘玉侠, 高俞奇. 外来流动人口的“再城镇化”研究[J]. 浙江学刊, 2014(4).
- [27] 黄容, 潘明清. 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基于LAIDS模型的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4(3).
- [28] 邱爽. 论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的良性机制[J]. 经济与管理, 2003(6).
- [29] 黄梦琪, 金钟范. 女性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来自CHFS的经验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2).
- [30] 朱德云, 王溪. 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1).
- [31] 钱龙, 缪书超, 卢海阳. 劳动力流动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治安感知——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 [32] 温忠麟, 张雷.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 157476703@qq.com

The Influence of Labor Mobilit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CFPS Panel Data of Three Periods

Liu Yucheng Wang Liy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requent flow of labor force in China, the fierce collision of life style and life concep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region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workers. Based on the 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panel data of three periods, a panel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its impact path by mean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abor mobility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s with migrant work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s without migrant workers. (2) Labor mobility will lead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 leading to the upgrading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from necessary consumption to enjoy consump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brought by labor mobility in the future. (3)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Labor mobility mainly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of men and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rural and central areas. (4) Both absolute income and expected income have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mechanism of labor mobility affect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role, group differenc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so 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labor mobility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the paper.

Keywords: labor mobility; household consumption; mediating effect; heterogeneity